

中国科举制度的南传与越南辞赋创作论

孙福轩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汉语言文学系, 浙江 杭州 310015)

[摘要] 中国的科举制度始于隋朝,延续至清末。它不仅对古代的政治、思想、学术、文化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并且东传至朝鲜,南传到越南,促成了两国的科举取士制度。根据两国史书,科举取士中诗赋占有突出的地位。相较于同时期的中国科举试赋,越南课艺赋与试赋的创作特征主要表现在题类和取径的多元化,有汉赋体、唐律体、李白体等;题材也多种多样,诸如咏史、景物、记事、拟古诸题的创制。而从赋史看,越南辞赋艺术对词章之学的发展、经史之学的渗融、赋学体系的构建以及由模拟到自立的变化,均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 越南; 科举试赋; 辞赋创作; 传播

Southward Spread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Vietnamese Fu Creation

Sun Fuxu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ity College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5, China)

Abstract: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started in the Sui Dynasty and persisted to the late Qing Dynasty. It not only had a very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ancient politics, ideology, academic and culture, but also spread east to Korea and south to Vietnam, contributing to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of the two countries.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two countries, the poem and Fu occupied a prominent position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Compared with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of China at the same period, the features of Vietnamese classing Fu and testing Fu, was mainly shown by various genres, such as Han's style (汉赋体), Tang's style (唐律体), Li Bai's style (李白体) etc. There were also a variety of themes, such as the creation of chanting history, scene description, narration and imitation. In the view of Fu history, the features of Vietnamese Fu had a certain positive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literature, infiltration of Confucian Classics (经学) and history, construction of Fu system, and the change from analogue to self-reliance.

Key words: Vietnam; Imperial Examination; Fu creation; communication

[收稿日期] 2010-10-17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2010-12-20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0YJA751065);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0CGZW09YB)

[作者简介] 孙福轩,男,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汉语言文学系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古代文学与文论研究。

一、科举制度南传与越南科举试赋制度

科举制度南传缘于越南对中国的依附关系,宋朝以前越南曾长期直属中央封建王朝统治,史称郡县时代或北属时期;自立以后,亦长期为中国的藩属国。由于与中国十分深厚的历史渊源,越南一直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科举考试自隋代产生以后,随着汉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以及政治与地缘等原因,越南于李朝时(1075年)便引进了科举制度。而其中唐宋以来的科举试赋^①,作为一项重要的考试制度,自然亦会对处于汉文化圈的越南产生积极的影响。据《钦定越史通鉴纲目》^②载:李朝仁宗太宁四年(1075)，“选明经博学者以三场试之,擢黎文盛首选入侍学。本国科目自此始”^①。1304年,陈英宗设定考试形式为四期:第一场考暗写,第二场考经义、诗、赋,第三场考诏、制、表,第四场考文策。考试内容开始有赋。而进士科于陈朝睿宗隆庆二年(1374)创立,考试取法于元。虽然考试内容每一代都有所变化,但试赋制度却一直保持下来了。黎朝以后,按明朝科举成式来实行。《大越史记全书》记载其试法云:

洪德三年三月,会试天下举人,取黎俊彦等二十六人。其试法:第一场,四书八题,举子自择四题作四文,《论》四题,《孟》四题。五经每经三题,举子自择一题作文,惟《春秋》二题并为一题,作一文。第二场,则制、诏、表各三题。第三场,诗、赋各二题,赋用李白体。第四场,策问一道,其策题以经书旨意之异同、历代政事之得失为问。^②

试教职。其试法第一场四书各一题,五经各一题。第二场赋一题、李白体。第三场制、诏、表各一题。^③

除了第三场(试教职在第二场)考试诗赋外,从内容到形式都与中国明代科举大同小异^④。阮朝于世祖嘉隆六年(1807)开乡试,模仿清代科举。阮圣祖明命三年(1825),初开会试恩科,并定试法^⑤:

先期铸会试之印,建试场与京城内之南。分为内外场及甲乙二围。照应试人数于围内各造号舍、悬名简……试题第一场制义经五题、传一题,第二场诏、制、表各一道,第三场排律诗一首、八韵赋一道,第四场策问一道、古文或十段、今文或三、四段。^⑥

又定殿试法,并规定进士题名碑立于文庙门外左右。明命十年(1832),还在科场中引进八股文这一考试文体。可以说,越南科举考试自李朝开科后,陈朝至黎朝、阮朝,乡试、会试均有一场考试诗赋,诗用唐律,赋用李白体,或古体,或四六,或骚选等形式。黎朝人黎贵悼云:“李时场文不传。陈时赋用骚、选体。本朝洪德中,会试法,赋用八韵律体,有隔句对;乡试法,赋用李白体格,正双关对,

① 关于科举试赋的确切时间,诸家说法不一。徐松《登科记考》卷二曰:“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际。”(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② 越南科举考试在《大越史记》、《大南实录》等史书中均有记载,具体情况可参见陈文《科举在越南的移植与本土化——越南后黎朝科举制度研究》(暨南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的导论部分,本文的试赋制度论述对此有所参考。

③ 黎太宗绍平元年(1434)进士科试法规定,乡试考四场。“第一场,经义一道,四书各一道,并限三百字以上。第二场,制、诏、表。第三场,诗、赋。第四场,策一道,一千字以上。”黎圣宗光顺三年(1462)定乡试例,先暗写“沈冗”一科。第一场,四书经义,共五道。第二场,诏制表,用古体、四六。第三场,诗赋,诗用唐律,赋用古体、骚选,三百字以上。第四场,策一道,经史世务出题,限一千字以外。与绍平元年同。洪德三年(1472)定乡试法:第一场,四书八题,其中《论语》四,《孟子》四,举子自择四题行文;五经每经三题,举子自择一题行文,唯《春秋》二题合为一题行文。第二场,诏、制、表各一篇。第三场,诗、赋各一,诗用唐律,赋用李白体。第四场,策问一道,其策题以经史旨意之异同、历代政事之得失为问。参见陈文《科举在越南的移植与本土化——越南后黎朝科举制度研究》(暨南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的相关论述。

④ 关于考试内容,1832年阮朝进行科举改革,把从前的四场考试改为三场:第一场考经义,第二场考诗、赋,第三场考文策。1850年,四场考试又被恢复:第一场考经义,第二场考文策,第三场考诏、表、律;第四场考诗、赋。除了一次短暂的罢废(1858年)之外,进士科举试赋在阮朝持续进行到1905年。阮朝于阮世祖嘉隆六年(1807)开乡试,其制度模仿中国清代科举。

其体则四平四仄相间,取其格调齐整,遵宋制也。”^①李朝由于年代久远(越南科举始于李朝仁宗太宁四年,但李朝科举只举行过四次,且录取人数不多,影响不大),考试的文章没有流传下来,而陈朝和黎朝时期的乡试、会试则仿照中国唐宋的诗赋取士之法,包括考试内容和诗赋格律,均考诗赋。黎朝乡试、会试又实行三场淘汰制,第二场诗赋在乡试、会试考试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如果不会作诗赋,第三场即被淘汰,也不能进入第四场。越南进士科的诗赋考试一直延续到阮朝后期,直到法国人进入越南后才逐渐减少诗赋考试内容。维新六年(1912)壬子科乡试,中圻各试场一并停罢诗赋,至此,延续数百年之久的越南进士科的诗赋考试才最终结束^②。

除乡试、会试外,广义的科举考试还包括制科及其他形式的特殊简拔,如黎朝的士望科、东阁科、制科等。黎朝制科与乡试、会试科同,也是考四场:第一场经义,第二场四六骈文,第三场诗、赋,第四场策文。而“试东阁之制,原自黎初”,其试法为“御题或五言诗,唐律,或论、辨、判、赋、颂、篇、铭、记、跋,无定式”^③,出题范围很广,主要目的是考核考生文学写作能力。宏词科的考试内容也与唐朝相似:“其试题,或诗赋,或料事,或策论,皆临辰随出,亦无一定之式云”,“赋、赞、颂、歌、咸无定体”^④。黎朝进士科殿试之后,朝廷还要举行新科进士应制考试,从洪德年间(1470—1497)到景兴(1740—1786)末年,黎朝一直坚持这一考试制度,考试的主要内容是创作诗赋、策文以及一些杂文,以选拔诗赋文章卓越的进士。而阮主统治的南方也设置了正途试、华文试、文职试等科目,其中正途试三场中的第二场试诗赋。

综上所述,由于受到中国科举制度的影响,诗赋作为越南科举考试中的两种基本文体,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但由于中国科举试赋制度发展的阶段性以及越南科举的本土化特征,在越南科举考试由李朝、陈朝到黎朝、阮朝的进程中,试赋的内容和崇尚的文体不尽相同。陈朝时用骚体和选体,黎朝时乡试赋用李白体,会试赋用八韵体,有时也用汉代的骚体。如光顺三年(1462)四月乡试第三场试诗赋,诗用唐律,赋用古体、骚选;洪德三年(1472)三月壬辰科会试规定,第三场试诗赋,赋用李白体;洪德六年(1475)三月乙未科会试第二场作诗赋各一题,诗用唐律,赋用李白体。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到中国科举试赋体制的影响,越南陈朝对应于中国的元代,元代科举试赋虽然经历了戊戌选试、延祐开科、至元废科、至正复科等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4],但一以贯之的是考试所用的赋为古体赋,尤其是祝尧在《古赋辨体》中提出“祖骚宗汉”、“以情为本”的创作主张,无疑对陈朝的科举试赋选择古体赋产生了重要影响。

而黎朝至阮朝所受到的影响则来自中国的明清两代,黎朝除了选派士人赴中国京师参加会试,还以四场取士,其试法和明朝的科举取士基本相同;而阮朝统治者则认为,“科举抡才,实关盛典”^{[3]卷一八九},于阮世祖嘉隆六年(1807)开乡试,阮圣祖明命三年(1825)开会试恩科。虽然黎、阮朝依循明清的科举试法,但明清科考的主要文体是八股文,会试和殿试中是没有辞赋创作的,黎、阮朝的科举试赋却有赋体要求,以律体为主(即八韵体,限为八韵的律体赋,韵脚可以顺押,亦可不顺押),偶有古体赋。这是什么原因呢?笔者认为一方面是缘于对陈朝科举试赋的继承(如采用李白体等),另一方面是缘于“赋兼才学”的文体特征,统治者出于为国家选拔治世之才的儒学关怀和政治诉求。且从广义的科举考试来看,明代也有科举试赋的记载^[5]。清代自开国之初,尤其是康熙帝以来就提倡唐代律体赋的创作,以“唐宋则用以取士,其时名臣伟人往往多出其中”的政治意识,承继了唐、宋而来的科举试赋制度,康熙十八年(1679)开博学鸿儒科,以《璇玑玉衡赋》为题考取士子。康熙

① [越]黎贵惇《见闻小录》卷二(上),越南汉喃研究院藏景兴丁酉年(1777)抄本(馆藏编号:VHv.1322/1-2)。

② 陈文《科举在越南的移植与本土化——越南后黎朝科举制度研究》,暨南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75页。

③ 同上,第103页。

④ 同上,第106页。

帝还命词臣考稽古昔,搜采缺逸,编纂《历代赋汇》,终清一世,唐代律赋都是科举试赋的最好的范本。

可以说,在历代的科举试赋中,唐代律赋的“清丽”之音和宏博气象都是统治者与赋作者共同的审美追求,也是当时黎、阮士子的共识。越南学人称:“唐宋以赋取士,自后讲求格律,日益精工,盖选词按部,范意就班,则知其得力于声韵者深也。故历代试士,靡不以律赋为正轨。”^{[6]序}这也就不难理解黎朝乡试、会试之诗赋用律实为唐朝进士科考试所规定的韵律,应试士人必须严格按照格律学习诗赋,讲求赋的格律声色了。以唐代律赋为正轨,为极则,以律是尚,不仅是中国的科举规范,越南亦然。至于科试中采用“李白体”和骚选、古体,一方面是对清代学使观风等试古体赋的取法,同时也是越南对中国借鉴后的超越与发展。

这里还要解释一下“李白体”。何为“李白体”,诸家均无界定,笔者认为应该是既有古赋风神又有格律要求的一种辞赋体式。李白的赋作继承了汉赋和魏晋六朝赋的创作风格,其大赋不仅有豪放博大的气魄和恢弘纵肆的笔调,体现出“辞欲壮丽,义归博远”的创作指归,更有前所未有的强烈的主体精神的张扬。祝尧《古赋辨体》云:“太白天才英卓,所作古赋,差强人意。但俳之蔓虽除,律之根固在。虽下笔有光焰,时作奇语,只是六朝赋尔。”^{[7]卷七}小赋则既有骚体、骈赋的情韵,又有散文的气势,句式不拘一格,挥洒自如,显露出浓烈的忧思精神和个体情怀。所谓“俳之蔓虽除,律之根固”即指出了李白辞赋的两个基本特征:散体化与格律化,当然还应有强烈的情感抒发。“李白体”是汉魏六朝赋学传统与时代精神、个人气质的结合,具有鲜明的文体和主体特征,这也是黎朝科举试赋取法李白赋的主要原因之所在。

二、越南科举试赋的内容

中国古代的科举试赋,缘于赋“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审美特征和历代统治者“崇论宏议、创业垂统”的政治需求,在创作上往往表现出恢廓声势、张皇其辞的博大气象以及欲讽反劝、雍容揄扬的颂美品格,“经”题赋成为历代科举试赋的主体内容。诚如清代阮亨《律赋经畬集》所云:“应制之赋以经命题,昉自有唐如裴晋公《岁寒知松柏后凋赋》、韩文公《明水赋》、李供奉《明堂赋》、元仆射《镇圭赋》、白尚书《习相远近赋》……我朝经学昌明,使抡材悉取经语以觐古学,故是编专采五经,若《论》、《孟》、《学》、《庸》、《周官》、《尔雅》凡在十三经之目者,间亦采焉。至于子史诸题,概不登录。”^{[8]凡例}并强调“熔铸经典之范……洵为作赋之‘本原’”^{[8]序}。从科举试赋的进程看,赋多以经世的姿态和致用的精神而倾向于以经命题。北宋承袭唐制,以“诗赋取士”,然初期杂用诸子,以广博学识。尽用经史题之制导源于宋仁宗景祐年间。由许结先生援引刘伯骥《宋代政教史》据《宋会要辑稿》整理的自太宗开宝六年(973)至仁宗嘉祐八年(1063)35次进士科殿试试题可以看出:景祐以前出题面较广,除经史题外,有《有物混成赋》(咸平五年殿试题)、《卮言日出赋》(淳化三年殿试题)等出于老庄,《桥梁渡长江赋》(开宝八年殿试题)、《不阵而成功赋》(太平兴国三年殿试题)等出于时政的考题^{[9]3847}。而景祐以后考赋则专出经史题,叶梦德《石林燕语》曰:“礼部试诗赋,题不皆有所出,或自以意为之,故举子皆得进问题意,谓之‘上请’。本朝既增殿试,天子亲御殿,进士犹循用礼部故事。景祐中,稍厌其烦读,始诏御药院具试题,书经史所出,模印给之,遂罢‘上请’之制。”^{[10]115}变“上请”为“模印”,“赋题不皆有所出”而为“经史所出”,既是制度的变迁所致,又与时代思想、文化思潮的嬗变相关。论者以其时理学的兴起为背景解释,颇多中之之言^①。此后历代相沿,虽清代后期试赋时或有所偏离,凸显其游戏精神,但终归

① 可参见许结《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中编“因革论”《南宋辞赋艺术探索》(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刘培《北宋辞赋研究》第二编第七节《北宋中期的理学思潮与辞赋创作》(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等相关论述。

以“典雅丽则”的经史赋为主流。

受中国科举试赋的影响,越南的试赋内容也表现出以经史为主体的倾向,举凡乡试、会试、制科试赋均“摹经范史”,表现出浓厚的经世致用情怀。下面即以《皇越历科诗赋》^[11]为例予以说明,见表1:

表1 《皇越历科诗赋》具体情况

科次	场次	赋题	用韵
甲午科	承天场	天地位万物育赋	以“致天地中和”为韵
	义安场	云行雨施品物流行赋	以题为韵
	南定场	凤凰来仪赋	以“治化周浹,凤凰来仪”为韵
	河内场	春气暄和万物畅茂赋	以“赞化育,致中和”为韵
乙未科会试		明光华弘于一人赋	以“参和在宇宙间”为韵
丁酉科	义安场	年谷丰符瑞至赋	以“春风和气,所在生辉”为韵
	南定场	仁者寿赋	以“冈阜山陵,日月松柏”为韵
	河内场	丰年为瑞赋	以题为韵
戊戌科会试		声教覃敷赋	以“大化神明,鸿恩溥洽”为韵
庚子科	承天场	青山绿树赋	以“此日中流自在行”为韵
	义安场	月恒日升赋	以“福之方进而不已”为韵
	南定场	巨海明珠名山良玉赋	以“众理求之此心”为韵(顺押)
	河内场	光披日表格于上下赋	以“德如天覆物”为韵
辛丑科会试		水未波鉴未尘赋	以“澄清九洲,光照万里”为韵
辛丑科	义安场	乾坤造化心赋	以“万紫千红总是春”为韵
	南定场	春育海涵赋	以题为韵
	河内场	凤凰鸣高岗,梧桐生朝阳赋	以“世平主圣,俊义自至”为韵
会试		诗者天地心赋	以题为韵
壬寅科	承天场	君明臣良赋	以“明良千载遇”为韵(顺押)
	南定场	龙兴致云赋	以“圣主待贤臣”为韵
	河内场	就如日望如云赋	以“德溥而化广”为韵
癸卯会试		升配大礼庆成覃恩中外宴赉臣工赋	以“君臣交修,情孚同乐”为韵
癸卯科	承天场	群生和万物殖赋	以“中和位育圣人功”为韵
	义安场	尧舜君尧舜民赋	以“乐尧舜之道”为韵(顺押)
	南定场	明明德于天下赋	以“笃恭而天下乎”为韵(顺押)
	河内场	揆文教奋武术赋	以“文武之道兼行”为韵
会试		南省奏丰登赋	以“风调雨顺,岁美民康”为韵
丙午科	义安场	江汉秋阳赋	以“化工之妙着于物”为韵
	南定场	蜃宇育群才赋	以“乐得英才教育”为韵
	河内场	河出图洛出书赋	以“道在天地间”为韵
会试		高蛮来廷下诏西征将士班师朝觐论功行赏赋	以“威震殊境,□催□功”为韵
丁未科	承天场	常茂观耕赋	以“所其无逸,康田即功”为韵
	义安场	君子德风赋	以“一人之化,如风鼓动”为韵
	南定场	圣人作万物睹赋	以“一人元良,万国以贞”为韵
	河内场	礼乐备天地官赋	以“圣人一天地”为韵

续表 1

科次	场次	赋题	用韵
会试		奉三无私赋	以“家给人足,近悦远来”为韵
戊甲科	义安场	宝天地化育赋	以“开后以裁成辅相”为韵
	河内场	以天下为一家赋	以“圣人之心,廓然至公”为韵
会试		仲春钦文殿首开经筵赋	以“亲贤国治,振作文风”为韵
庚戌科	河内场	性与天道赋	以“至理无言绝浅深”为韵
	南定场	寅宾出日赋	以“敬为万事根本”为韵
辛亥会试		四气为政赋	以“运而无积,天下咸归”为韵

《皇越历科诗赋》为阮朝乡试及会试的应制诗赋选,共收录 33 首诗、49 篇赋文。从上表可以看出,分场乡试(分为义安、承天、南定和河内等)和会试中,除了有限的几篇写景赋(庚子科承天场《青山绿树赋》、丙午科义安场《江汉秋阳赋》)和写时事的《高蛮来廷下诏西征将士班师朝觐论功行赏赋》、《南省奏丰登赋》外,题材多采自中国古代经传和史籍,内容涉及儒家政教、君道忠臣、格言诠释、颂扬圣贤、歌唱祥瑞等。如《天地位万物育赋》出自《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云行雨施品物流行赋》出自《周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终始,六位时成”;《凤凰来仪赋》出自《书·益稷》“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凤凰鸣高岗,梧桐生朝阳赋》出自《诗经·卷阿》“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等等,均是如此。

其他如《博学宏辞科文选》^[12]即以“黄钟为万事根本”为题^①;佚名《竹堂赋集》^②收 136 篇赋,其中有《夫子堂赋》、《登泰山赋》、《伯夷居北海赋》等经史题;《罗岸杜大家赋集》^③为赋文集合编,收录取材于中国史籍的 23 篇赋文,有《子击磬于卫赋》、《子入太庙每事问赋》、《浴沂赋》等;《凌云气赋集》^[13]编辑于明命戊戌年(1838),书中收录赋文 160 篇,内容涉及舜弹琴赋“南风”之歌、周文王苑囿、苏武守节等事;《赋则新选》^④是根据清朝“赋则”写作的赋文集,书中收录 242 篇赋文,均取材于经传、中国历史、古诗及杂著,内容涉及政治、经史、寺庙等;《度针编》^⑤篇末收录赋文 14 篇,其题材也均来自中国典故,如《倪宽带经而锄赋》、《雪夜幸赵普家赋》、《禹闻善言则拜赋》等;《经义诗赋杂抄》^⑥中亦有《禹拜昌言赋》、《鲁城弦颂赋》等,涉及政治、教化、伦理等内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书末附载宋朝理学家周敦颐的若干诗篇和《爱莲说》,可见理学思想对越南试赋的渗透与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汉喃文献中还有专门咏经、史的赋集,如《史赋》^⑦是一部取材于中国历史的赋文集,含目录一篇,书中共收录赋文 64 篇,内容涉及泐水破前秦、四夷宾服、文德武功、仙女送刘阮(传说故事)等;《北史赋》^⑧也是咏中国历史的赋文,正文讲述自盘古至清同治年间的中国历史,附载有关越南

① 以下赋选集的说明和评述参见刘春银、王小盾、[越]陈义主编《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2002 年版;刘春银、林庆彰、[越]陈义主编《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补遗》,(台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亚太区域研究专题中心 2004 年版。

② [越]《竹堂赋集》,越南汉喃研究院藏成泰元年(1889)抄本(馆藏编号:V Hb.190)。

③ [越]杜辉琬、杜锡翁《罗岸杜大家赋集》,越南汉喃研究院藏抄本(馆藏编号:V Hb.66/1-2)。

④ 今存印本三种:一本为香茶会文堂 1833 年印本,2 册 1028 页,高 26 厘米,宽 15 厘米;一本为绍治三年(1843)盛文堂印本,2 册 1028 页,高 27 厘米,宽 16 厘米;一印本,高 27.5 厘米,宽 16 厘米,存卷九至卷一〇。各本均有凡例、目录,共十卷。由阮怀永(字叔贞)选,范廷瑗(字润甫)校正,李文馥序于明命十四年(1833)。附有论作赋法之文章及范文一篇。

⑤ 佚名《度针编》,越南汉喃研究院藏同庆二年(1887)、成泰五年(1903)抄本(馆藏编号:A.2406)。

⑥ 佚名《经义诗赋杂抄》,越南汉喃研究院藏抄本(馆藏编号:V Hb.66/1-2)。

⑦ 佚名《史赋》,越南汉喃研究院藏抄本(馆藏编号:V Hb.2245)。

⑧ 佚名《北史赋》,越南汉喃研究院藏抄本(馆藏编号:A.130)。

历史的赋文,起于鸿庞氏,迄于第六代雄王,并有仙容遇褚童子等内容;《南史赋》^①是有关越南历史的赋篇,书中涉及鸿庞氏至黎昭统帝的历史,中有扶董天王、媚珠、褚童子等英雄、烈女的事迹;《经传史子赋集》^②是取材于中国经传、史籍及诸子著作的赋文集,书中共收录783篇赋文,内容涉及道德、政治、礼仪等各个方面^③。

综上所述,虽然相较于同时期的中国科举试赋,越南课艺赋与试赋的创作在题类和取径上表现出多元化的倾向,有骚体、汉赋体、唐律体、李白体等,题材也多种多样,诸如咏史、景物、记事、拟古诸题的创制,但不可否认的是,经史题依然是越南历朝科举试赋的主体,要言之,其因有二:

一是越南科举考试模仿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受到汉文化的深刻影响。唐代后期以来特别是赵宋立国后,随着科举制度的规范化,统治者惩于唐末五代为文绮艳的创作倾向,转而强调文章的经世致用,尤其是王安石的科制改革,试经义而废诗赋,“尊经”必然成为试赋的内在要求,元仁宗时即拟定科考政策为“以经术为先,辞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可以看出,历代统治者考赋的重点并不在于彰显文采声华,而是取法于“实用”,都是意在配合国家的政治需要,而经史为赋就成了当然的创作诉求。

二是越南社会文化思想和统治阶层的需要。李、陈两朝,佛、道与儒并重。越南虽然出现了一个儒士阶层,但在政治和思想领域中并没有完全取代僧人的势力。黎朝时,儒家思想则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据《大越史记全书》记载:黎太祖顺天元年(1428),采纳儒臣阮荐的建议,在京城设国子监……^{[2]卷一六}太宗绍平元年(1434),始定取士科,会试中选者赐进士出身……并新刊四书大全,经学日趋兴隆^{[2]卷一七}。黎圣宗光顺八年(1467)三月,置五经博士,专治一经,以授诸生……夏四月,颁五经官板于国子监^{[2]卷一八}。学习儒教的经典著作和中国历代王朝的历史成为儒生的头等大事。虽然黎朝后期、阮朝时儒家思想受到一定的冲击,但无疑终越南之世,儒家思想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于儒家士子来说,一切理智、情感和行为都要符合“圣贤之道”。科举试赋制度作为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举措,自然承担起以文敷教,“赋以载道”的治世功能,而赋也理所当然地成为“衔华佩实”的经史之文。

三、越南科举试赋的影响

如前所述,诗赋在越南进士科和应制考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诗赋考试又刺激了越南汉文诗赋持续的创作热情,其对词章之学的发展、经史之学的渗融、赋学体系的构建以及由模拟到自立的变化,对汉文诗赋文学在越南南部地区的传播和发展均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具体到越南诗赋艺术史的发展与变迁来看,科举试赋的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促进了越南词章之学的发展。越南与中国文化在历史上有着复杂而漫长的接触过程,附属时期几近千年(约公元前111年至公元938年),词章之学实导源于中国。随着科举制度的实行,辞赋创作逐渐兴盛(据笔者寓目和各书目所记载,在数千篇以上),而科举试赋之于辞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辞赋创作与赋集编纂两端,其中历科诗赋的创作与编纂尤为突出。首先是沿用中国的赋集编纂之例,越南选家编辑汇选了大量辞赋作品集,以名家赋作昭示出越南词章之学的自立。如《群贤赋集》^④,据阮天纵的序知其为黄萃夫所编,录赋一百余篇,今存六卷,卷一收录程、胡时代的作品,

① [越]杨琳《南史赋》,越南汉喃研究院藏抄本(馆藏编号:VHv.1595)。

② 佚名《经传史子赋集》,越南汉喃研究院藏抄本(馆藏编号:VHv.602/1-7)。

③ 此外,咏史赋还有范清、阮文交、潘清简、张国用编的《钦定咏史赋》,以中国自伏羲至明朝历代帝王的事迹为题材;阮朝集贤院奉旨编撰的《咏史赋》(一名《南朝翼英皇帝与内阁廷臣集成咏史赋》),吟咏中国自五帝至隋代历代帝王事迹等。

④ [越]阮天纵、阮传、镐郡公等编《群贤赋集》,越南汉喃研究院藏抄本(馆藏编号:A.575)。

卷二至卷六收录“国朝”即黎朝作品；作者有阮汝弼、张汉超、阮飞卿、李子璠、阮梦荀、梁如鹤、阮廌、阮直、阮维则、阮天纵等人，作品有《玉井莲赋》、《汤盘赋》、《董狐笔赋》等篇目。而《玉井莲赋》是越南辞赋大家莫挺之的作品，众所公认的越南汉赋首篇^①，在越南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文曰：

客有：隐几高斋，夏日正午。临碧水之清池，芙蓉之乐府。忽有人焉，野其服，黄其冠。迥出尘之仙骨，凜辟谷之癯颜。问之客来，曰从华山。乃授之几，乃使之座。破东陵之瓜，荐瑶池之果。载言之琅，载笑之璫。既而目客曰：“非爱莲之君子耶！我有异种，藏之袖间。非桃李之粗俗，非梅竹之孤寒。非僧房之枸杞，非洛土之牡丹。非陶令东篱之菊，非灵均九畹之兰。乃泰华峰头玉井之莲。”客曰：“异哉！岂所谓藕如船兮花十丈，冷比霜兮甘比蜜者耶？昔闻其名，今得其实。”道士欣然，乃袖中出。客一见之，中心郁郁。乃拂十样之笺，泚五色之笔。以为歌曰：“架水晶兮为宫，凿琉璃兮为户。碎玻璃兮为泥，洒明珠兮为露。香馥郁兮层霄，帝闻风兮女慕。桂子冷兮无香，素娥纷兮女妒。采瑶草兮芳洲，望美人兮湘浦。蹇何为兮中流，盍相返兮故宇。岂溟落兮无容，叹婵娟兮多误。苟予柄之不阿，果何伤乎风雨。恐芳红兮摇落，美人来兮岁暮。”道士闻而叹曰：“子何为哀且怨也？独不见凤凰池上之紫薇，白玉堂前之红药。复地位之清高，藹声明之昭灼。彼皆见贵于圣明之朝，子独何之乎骚人之国？”于是有感斯言，起敬起慕。哦诚斋亭上之诗，赓昌黎峰头之句。叫阖闾以披心，敬献玉井莲之赋。

以汉赋的对答体形式，寓自荐之意，化用屈赋与韩愈的《古意》诗，融洽无间，骈散结合，句式多变（骚体句、散体句、俳体句穿插运用），风格哀婉清丽，不失雅正之旨，确为不可多得的名篇。又如《名赋合选》^[14]（别名《名赋抄集》、《名赋集》、《八韵赋》、《八韵赋合选》、《黎朝八韵赋》等），是越南自陈至阮初的名家赋文选，书中收录阮贤、莫挺之、黎贵悖、阮攸、范贵适等著名诗人赋家的作品，内容涉及政治、军事、人事、地舆、时节各方面，并附有中国名家李白等人的赋文。再如《名家诗赋合选》^②也是当时著名的诗赋选集，此书第一册首题为《赋谱》（出《拣金录》）；继为赋文诗文选，包括《凤城名作》、《赋略》、《五言诗》等几组作品；第二册为赋文选，首为探花裴辉庭的作品；第三册亦为赋文选，首为认斋的赋文作品；第四册亦为赋文选，有目录及若干诗；第六册题为《龙仙张先生场赋集》，首为张先生龙仙场的赋文选和《探花学堂家川场赋文》，后为一组赋文作品，分列于“细切”、“庄雅”两类，各篇均有详细眉批，并有作者名，于赋学研究甚有价值^③。

不仅如此，黎朝士人还将本国科举之诗赋场文编辑成册，刻印发行，作为举子学习的范文，如进士李陈瑕编辑《天南历科会赋选》^[15]一卷，采自黎朝正和十五年（1694）甲戌科至景兴年间之进士科会试赋文。而《黎朝三十三科会试诗、赋选》则于每科试卷中选择最佳诗、赋各一篇。据阮廷傖（一作素）撰于黎景兴癸巳年（1733）的序言，此书由邓陈琰及其二子编辑历科诗赋作品而成，并附此三人科考中格试卷。明命十四年（1833）编辑刻印的《新拣应试诗赋》^[16]，内容包括作赋的格律韵体以及中国历代著名诗人、辞赋家如李白、王维、杜甫、张籍、陆贽、骆宾王、独孤绶等名家的诗赋作品，成为越南生徒士人学习和应试参考的经典范文^④。而中国诗赋对越南的影响还可以从越南重印中

① 按，《玉井莲赋》实非越南赋的首篇。《越史略卷二·阮（李）纪》里面有一条关于赋的记载：“癸未明道二年（1043）……夏四月，王幸武宁州松山寺，见其颓殿中有石柱倚压，上慨然有重修之意，石柱忽然复正，因命儒臣作赋以纪其异。”这是越南书籍中最早出现“赋”这个字的一则材料。由上可知，在李朝（1010—1225）时越南作家已经用赋这种体裁来创作了。然考诸文献，早在八、九世纪已有越南人所作的赋，即姜公辅的《白云照春海赋》，现存《文苑英华》。参见[越]潘秋云《越南赋对中国赋的借鉴与其创造》（复旦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一文的相关论述。

② 佚名编《名家诗赋合选》，越南汉喃研究院藏抄本（馆藏编号：3018/1-6）。

③ 此外尚有《历朝名赋》，为黎朝名家赋文集（含目录一篇），书中收录63篇赋文，如《金帛财物赋》、《汉王哭项王赋》、《山水文籍自娱赋》；黄华夫选辑《群贤赋集》六卷，采录陈朝和黎朝初年诸赋文如《玉井莲赋》、《白藤江赋》等名篇以及科举考试之“八韵赋”名作等。

④ 参见陈文《科举在越南的移植与本土化——越南后黎朝科举制度研究》，暨南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93页。

国赋学之书,或编辑中国之辞赋名篇作为学习和举业的参考书窥见一斑。如余丙照《分类赋学指南》在越南重印时,黎朝人就在原著基础上加了注释,以便举子学习。此外,如前揭《名赋合选》选录李白的赋作多篇,《新拣应试诗赋》选录李白、王维、杜甫、张籍、陆贽、骆宾王、独孤绶等名家的诗赋作品等,均是如此。

第二,试赋对创作技巧的追求,以及有关赋作声律、词章的评点,促进了越南辞赋鉴赏艺术的发展。这既是辞赋发展的必然趋归,也是辞赋学自立的标志。辞赋鉴赏学的兴起源于赋的声律化与藻丽倾向,尤其是唐代以来的律赋创作,如清代李调元的《赋话》即是通过大量的作品赏鉴,揭示出唐、宋、元朝赋作的风格理论的。林联桂《见星庐赋话》卷二评鲍桂星《夏日之阴赋》“赋题不难于旁渲四面,而难于力透中心。而名手偏能于题心人所难言之处,分出三层、两层意义,攻坚破硬,题蕴毕宣”,即是对清律赋佳构的品鉴。而科举辞赋特有的艺术形式,如同题、模拟、和韵、评点等,更有利于辞赋艺术的揣摩对比,如今散落在试赋选集中的圈点、旁批、眉批注评、尾评、解题、总评等,就涉及赋的渊源、结构、功用、风格、字句、技巧诸方面,成为越南辞赋鉴赏学构建的重要理论资源。如《新拣应试诗赋》曾附论诗赋的写法,前揭《名赋合选》,首为《赋谱》,介绍赋体的源流、特点、创作技巧;《竹堂赋选》^[17]虽选文少于《竹堂赋集》,但难字及典故的批注方面则更为详细;《阳亭赋略》、《阳亭赋谱》^①赋文中间有嗣德等人的评语;《诗赋杂抄》^②收有黎廷延、吴世荣、三元陈大人、武洳等人的学堂赋文,其中若干篇有评语等。而所有这些,再加上越南使北文人的诗赋唱和,与中原文士的序文赏鉴,细加搜集,便成为越南辞赋批评史中不可多得的材料。

第三,越南的科举试赋丰富了越南汉文创作的宝库,而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创作技巧的成熟,逐渐由模拟走向自立,形成越南辞赋的民族特色。从越南辞赋创作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来看,越南汉赋创作的早期(包括后期的一些赋家赋作)完全是模拟中国赋的创作路数,无论内容、体裁还是艺术表现方式,都是如此。内容以经史为主,参以写景、咏物、咏史等;体裁有骚体赋、俳体赋、律赋和文赋、李白体等;艺术方法包括铺陈、描写、夸张、虚构等。但到了黎朝辞赋创作的繁荣时期,越南文人便不再满足于单纯的模仿之作,他们不断开拓辞赋艺术新的表现领域和艺术技巧,渗融进自己民族的文化精神,形成了越南辞赋独特的风格特色。如律体赋,起始以唐宋是尚,但相较于唐宋律赋,越南赋作特别讲究篇幅的结构和文章的起承转合。据杨广涵主编的《越南文学史要》,越南汉律赋的结构要求十分严格。典型结构有六段:第一段叫“笼”,介绍全篇内容及其意义;第二段叫“辨原”,说明这篇赋名的渊源故事;第三段叫“释实”,是讲述故事或解释篇名的意思;第四段叫“敷衍”,详细地说明、表达与扩大有关赋内容的事物;第五段叫“议论”,进一步探讨其意义;第六段“结”,是这篇赋的收尾^③。潘秋云在从体裁和艺术方法两个层面论述了越南汉赋对中国赋的借鉴后总结说:“总体来看,越南汉赋在形式上常出现一种‘综合体’,即采用各种赋体的特点。一篇普通的越南汉赋无论借鉴了哪一种赋体(而通常是律赋体),都会有同样结构的词句两两并列、讲究对偶、音韵协调、用典使事的骈赋特点,采用一些客主或问答成分,在层次转递时常用辞赋的‘于是’、‘尔乃’等连词,并普遍用带‘兮’的骚体句式。因此,中国赋的原汁原味在越南汉赋中是不太常见的,而或多或少融入了越南文化的自身特色。应该说越南汉赋是在中国赋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并发展出自己的风格。”^{[18]60}由模拟到创新,越南辞赋走过了一条借鉴与超越的发展

① 为阳亭(即吴世荣)选评。书中收录吴世荣本人以及杜发、吴葆峰、范伟、阮猷、邓辉等人取材于儒家经典的赋文集《试赋集》,其题材采自《论语》、《孟子》、《扬子》,如“郁郁乎文哉”、“善交得人心”、“造化为工”等。

② 佚名编《诗赋杂抄》,越南汉喃研究院藏抄本(馆藏编号:A.1089)。

③ 参见杨广涵主编《越南文学史要》,转引自[越]潘秋云《越南汉赋对中国赋的借鉴与其特点》,《中国韵文学刊》2009年第1期,第57-63页。

道路^①，而这一点也正是越南汉赋自立的重要标志。

第四，与经史之学的渗融和共进。科举辞赋虽为词章之学的一部分，但缘于“赋兼才识”的博雅品格，往往通过其形象生动的创作实践，或隐或显地体现出当时的学术取向。从辞赋史与学术史的双重演进来看，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辞赋创作与经史之学的渗融和共进。而辞赋创作的学术化，与赋体自身的类书化倾向、赋兼学识以及唐宋以来科赋“经史命题”均有历史的渊系^{[19]203-220}，越南科举试赋所体现出来的学术特征，与儒学南传，越南陈、黎时期的儒学兴盛以及史学发兴相关^②，两者形成了良性的互动，经义借辞赋而宣扬，辞赋以经史而涵蕴，两者相得兼彰。而辞赋对经史之学的推动及影响，也构成越南辞赋学十分重要的方面。

四、小 结

综上所述，越南不仅在北属时期受唐诗汉赋的熏染，而且在独立之后，仍然继承中国唐朝以来诗赋取士的传统和试法。陈、黎时期，不仅进士科取士的诗赋考试制度化，而且应制考试、试东阁科、士望科乃至武举考试均有诗赋题目，且一直延续到阮朝，最后因外国势力的入侵（其中也与喃文学的发展有关），才逐渐淡出历史的舞台。

越南科举试赋的发展对越南的汉文创作产生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辞赋创作的进程来看，促成了越南辞赋（包括其他文学）的自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品格，同时对经史之学在越南的发展也产生了十分直接的影响。毫不夸张地说，科举试赋对越南自陈朝以来的政治与文化建设，可谓功莫大焉。

但正如中国自唐以来的诗赋考试一样，由于对诗赋的韵律作了严格的规定，从而限制了士子思想和文学才能的自由发挥。甚至有些越南学者认为，越南科考试赋只是举子应试之作，其场文并没有多少佳作。黎朝学者范松年在《雨中随笔》之“诗体”中说：“若论举子场屋之诗，则自前黎以上，虽不能并驾古人，然其命题之意，亦有能仿佛之者。中兴之诗……关韵专押用入题句，局促拘阂，从古未闻。故举子之诗，苟且趋辰（时），率多鄙俚。想二百年间，高才硕学出于其途者，不为不多。而程度阻之，鲜堪传诵。应制东阁之诗，则用五言排律长篇，多者七十韵，少者五十韵，或三十韵，其制，关韵押在首句，率用僻题孤韵，迫人于险。故视会试、乡试诗韵题为尤难。余每读《吉川据笔》至‘辰欣逢至治，臣愿娶三妻’之句，未尝不为之喷饭也。”^③虽然是言诗，但于赋也是适用的。科举试赋是把双刃剑，对诗赋（文学）的发展既有推进作用，也有束缚和限制作用，我们要区别待之。

[参 考 文 献]

[1] [越]潘清简等：《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台北：台湾“中央图书馆”，1969年。[Pan Qingjian, et al, *Chronicle Schema of Vietnam History*, Taipei: Taiwan Central Library, 1969.]

- ① 可参见[越]潘秋云《略论越南汉赋对中国赋的借鉴与其创造》，复旦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其第二章《越南赋在形式及艺术特征方面对中国赋的借鉴》、第三章《越南赋在题材及主题思想方面对中国赋的借鉴》，主要谈论越南汉赋对中国的借鉴；第四章《越南汉赋在内容上的创造》分为三节，分别从历史地理风貌的详实描绘、传统思想的独特表现（关于世道人生和人道思想）、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的独特表现突出越南赋的创造。
- ② 关于越南儒学、史学的发展，可参见何成轩《儒学南传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郭廷以等《中越文化论集》，（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6年版；李未醉《古代越南史学对中国史学的继承与创新》，载《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第25-26页；梁志明《论越南儒教的源流、特征和影响》，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第26-33页。
- ③ 范松年《雨中随笔·科举》，越南汉喃研究院藏手抄本（A.145），第151-153页。

- [2] [越]吴士连等著、陈荆和编校:《大越史记全书》,东京:兴生社,昭和59年(1984)。[Wu Shilian, et al, *Vietnam History Book*, proofed by Chen Jinghe, Tokyo: Kingsheng Press, 1984.]
- [3] [越]张登桂等纂修:《大南实录正编》第二纪,东京:庆应义塾大学言语文化研究所,1961年。[Zhang Denggui, et al, *Danan Shilu Zhengbian: Vol. 2*, Tokyo: Institute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Keio University, 1961.]
- [4] 李新宇:《论元代考赋制度的变迁》,《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第42-48页。[Li Xinyu, "The Changes of Testing Fu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the Yuan Dynasty," *Journal of Literary Review*, No.1 (2009), pp.42-48.]
- [5] 孙福轩:《明代科举试赋考》,《科举学论丛》2010年第1期,第39-41页。[Sun Fuxuan, "A Research on Testing Fu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the Ming Dynasty," *Journal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Forum*, No.1 (2010), pp.39-41.]
- [6] [越]善堂门弟编:《善堂赋草》,成泰十年(1839)新刊。[Shantang Mendi(ed.), *Shantang Fucao*, 1839.]
- [7] 祝尧:《古赋辨体》,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6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影印本。[Zhu Yao, *Gufu Bianti*, in *Siku Quanshu: Vol.1366*,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5.]
- [8] 阮亨:《律赋经畬集》,清道光十九年(1839)刻本。[Ruan Heng(ed.), *Lüfu Jingshe Ji*, 1839.]
- [9] 许结:《北宋科制与理论赋考述》,见莫砺锋编:《第二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837-857页。[Xu Jie, "A Research o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he Fu on Philosophy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in Mo Lifeng (ed.),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iterature of the Song Dynasty*,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3, pp.837-857.]
- [10] 叶梦德:《石林燕语》,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Ye Mengde, *Shilin Yany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4.]
- [11] 佚名:《皇越历科诗赋》,嗣德三十二年(1879)梓文堂印行本。[Anonymous, *Huangyue Like Shifu, Ziwentang*, 1879.]
- [12] [越]武辉翼、陈有翼、黎有笔等编:《博学宏辞科文选》,嗣德四年(1851)柳文堂刻本。[Wu Huiyi, Chen Youyi & Li Youbi, et al (eds.), *Boxue Hongcike Wenxuan*, Liuwentang, 1851.]
- [13] [越]黎迺斋、武鲁斋、陈震甫编:《凌云气赋集》,明命戊戌年(1838)刻本。[Li Renzhai, Wu Luzhai & Chen Zhenfu(eds.), *Lingyunqifu Ji*, 1838.]
- [14] [越]恩光侯编:《名赋合选》,嘉隆十三年(1814)海学堂印行本。[En Guanghou (ed.), *Mingfu Hexuan*, Haixuetang, 1814.]
- [15] [越]阮廷倬、邓陈琰、邓凭等编:《天南历科会赋选》,黎景兴癸巳年(1733)刻本。[Ruan Tingsu, Deng Chenyan & Deng Ping, et al (eds.), *Tiannan Like Huiyu Xuan*, 1733.]
- [16] 佚名:《新拣应试诗赋》,明命十四年(1833)柳斋堂刻本。[Anonymous, *Xinjian Yingshi Shifu*, Liuzhaitang, 1833.]
- [17] [越]吴世荣选、阮遵一编:《竹堂赋选》,嗣德乙亥年(1875)写刻本。[Wu Shirong & Ruan Zunyi (eds.), *Zhutangfu Xuan*, 1875.]
- [18] [越]潘秋云:《越南汉赋对中国赋的借鉴与其特点》,《中国韵文学刊》2009年第1期,第57-63页。[Pan Qiuyun, "Vietnamese Fu's Reference to China 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Journal of Chinese Verse Studies*, No.1 (2009), pp.57-63.]
- [19] 许结:《赋体文学的文化阐释》,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Xu Jie,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F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5.]